

关于张闻天的点滴忆述

陈瑞铭 *

张闻天在 1959 年七八月份的庐山会议上,被控“反党”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个罪名继而被罢官以后,在这一年的 11 月,多次主动请求为党做些工作,表示不愿“赋闲”在家,最后经中央批准,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经济研究所工作,名分为“特约研究员”,其时,他还保留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

当时的所长是孙冶方。他对张闻天的到来,很欢迎。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孙冶方就认识张闻天了。1925 年秋,他们二人同坐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所领导班子商议,张闻天被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参加学术活动。

我从 1956 年初到 1960 年秋,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留学五年,毕业后回国,被分配在经济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有幸与张闻天一起聚会、探讨学术问题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我的亲身观察与感受,我认为,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纪念张闻天同志》一文中,称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的评价是生动传神并恰如其分的。本人得益于张闻天伟大人格的启迪与感召,不管祖国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始终没有失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信仰。诚如列宁所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此处不拟全面评述张闻天,仅就亲身所见所闻来作点滴的忆述,也可算是以“纪录片”的方式来留存些许史料吧。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初见张闻天

1960年秋,我到所不久,同室的张纯音告诉我,明天张闻天要到我室来参加学术研讨会。对一个留学生来说,张闻天的名字并不陌生,他出任过驻苏大使,以后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之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曾听到传闻,他有一段时期在党内的地位比毛主席还高哩,是什么“总书记”之类的吧。那时的一般青年学生对党史的了解浮光掠影,净听到一些传闻而已。我始终弄不明白:怎么张闻天的“官”越做越小了呢?但怎么也不至于降到经济所来工作吧?于是惊奇地问张纯音:“这样的大人物会到我们小小的研究室来参加讨论?”她说:“你没听说他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他现在是我所的特约研究员。”留学时,组织不对我这样的党外学生(我那时是共青团员)透露国内的重大政治信息,自己又一心埋头应付考试,所以就极其闭塞了,连庐山会议这样的惊天大事也茫无所知。

我不禁想:鼎鼎大名的张闻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待见到他本人时,却感到有些一般化,未免觉得不符合脑子里浮现的“传奇”色彩。他是那么温文尔雅、淡泊、慈祥、平易近人。而说话又是那么轻声细语,还带着浓浓的吴语口音,类似于朱自清、叶圣陶那样的教授、学者。

二、张闻天的魅力

接触几次以后,我对张闻天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心里想:张闻天毕竟还是张闻天。闻天同志写作极其勤奋,每当写完一篇初稿,总要先交给我室研究人员讨论、提意见,然后再作修改、补充。真可谓虚怀若谷。一次,一位青年同志说:“……总之我个人认为,闻天同志的上述提法未免有些‘破定’。”张闻天耐心地听完了他的意见,微笑着说:“你的意见有些道理,有参考价值。不过,你这个‘破定’的说法也未免有些破绽哟。”大家都轻松愉快地笑了起来。张闻天善于寓批评、帮助于幽默、谐趣之中,既使被帮助者易于接受,又活跃了气氛。

60年代初期,我们吃得差而少,有些同志患轻微浮肿,室内有人提议:隔一段时间凑份子去北海“仿膳”改善一下伙食,可以利用“学术聚餐会”的名义,以免别人“上纲上线”说成“自由化”;咱们敲研究室里这些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当我们一些年轻研究人员将这一动议向张闻天、孙冶方等提出来时,他

们欣然同意。要知道,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年代,这类活动是极其“离经叛道”的,也就是他们这样的非凡领导人才敢于拍板。记得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等老同志每次各出40元,副室主任等中年学者各出20元、10元不等,而我们年轻人只出1元或5角。在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家有说有笑,亲如一家。我在1962年写过一篇《昌黎集市贸易调查报告》,曾被中央内部刊物转载,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只要有利于生产,即使是‘投机贩运’又有何妨!大不了让投机者赚几个钱。”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1962年4月至6月也曾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省市的城镇农村进行了一次关于集



张闻天

市贸易、价格等问题的调查并准备写成报告上报中央,找我个别聊了几次,其中议到当时流行的“投机贩运”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否属违法乱纪的范围等。因此我们有些交往。否则,他怎么会知道我呢!组里可有十五六个人呀,个个都比我“引人注目”。在闲聊中,他得知我爱人怀孕之事。在一次聚餐后,剩下两个鸭架子。在困难时期,这可是“宝贝”,不少人心里想拿,但又都不好意思拿。正在相互推来推去之际,张闻天发话了:“陈瑞铭同志,你拿去吧,你的爱人不是正怀孕吗。带回去让她补一补。”大家都说:“对,对。”我说:“小廖的爱人也怀着孕哩。”张闻天说:“那就一个人一个好啦。”我惊奇于这位留学过三个国家、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内传奇大人物关心群众竟会如此体贴入微。这样的人会是“反党”的吗?人们的正常思维与健康思维都丢到哪里去了?这不是自毁长城吗?想到这些,不禁感到一阵酸楚。

他对普通小民真诚关爱,以后还听到不少事例。1969年,他被发配到肇庆去落户以后,原来为他服务的勤杂人员孙时平和炊事员黄广祥被分配到经济所干校,列入经济所的编制。孙时平用他那宽厚粗糙的巴掌一撸嘴巴说:“嘿,每次闻天同志出差回来,总给我带两瓶酒,他知道我爱喝两盅呀。那日子!钱就放我兜里,买完菜不用报账。你去报,刘英(张闻天的爱人)不让哪。她说:‘小孙,月底结总账,别来烦我!’”那可是张闻天在位得势的岁月呀!得势时尚且如此尊重、信任、关怀身边的勤杂人员,难怪炊事员黄广祥,在1972年稍有松动,出现机会时,



立即申请奔回张闻天的身边,照顾二老的生活去了。劳动人民没有那些“官场”人物那么势利。

1961年,由孙冶方主持、全所主要科研力量参加编写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初稿完成,共110万字。在两个月多的审稿全过程中,张闻天都参加了,发表了许多很精彩的观点,如:要学《资本论》的方法结构来写,“学而不套”,不可把教科书写成政策辩护的汇编或口号的集成。他十分赞成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全书红线。反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他大力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反对唯意志论。他批评急躁冒进,强调综合平衡。他在按劳分配、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企业利润、密切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等方面也都有比较系统的发言或插话。总之,几乎在一切观点上都与当时钦定的极左的政治挂帅路线有所偏离,甚至直接对立。原因在于,他认识到,经济建设与政治革命、战争等毕竟有所不同,因此解决的手段、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他说,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张闻天在1961年写了几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文章,1962年又写了一份关于扩大开放集市贸易,取消许多不必要的限制的调查报告,还上报中央。一次讨论会后,一位中年学者悄悄地对我说:“闻天同志真有些书生气,迂得可以。这类与现实联系那么密切,政治敏感度那么强的文章,以他目前的处境,躲还来不及哩,能去碰的吗?他真是太不聪明了,太不善于保护自己了。”当时我刚从苏联回来不久,世外桃源中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碰?为什么不聪明?”他欲言又止,最后苦笑一下说:“你呀,吃几次苦头,慢慢就会明白了。”果不其然,应验如此快速,到1964年10月份的经济所“四清”中,张闻天在《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会上的发言以及这些文章与调查报告就被康生操纵的工作组定为“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重要“罪证”,更不要说“文革”中因此而受到的非人磨难了。我一方面感到张闻天的确太多书生气,不管受到多少误解和不公平打击,仍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现实问题的理论与阐述,没有丝毫消极、退隐的情绪;总想“致君尧舜上,为使风俗纯”。如此为国为民不顾个人毁誉得失,甘冒矢石,痴心不改,令人由衷敬佩。另一方面,心里想,那位同志真精哪,很有点先见之明哩。现在想想,可惜我国那些年月“聪明人”太多了,而像闻天同志这样的“迂夫子”又太少了。否则,国家何以会走那么多、那么大的弯路!

三、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1961年初,我被下放到河北省昌黎县财委去理论联系实际,具体负责管理集市贸易的工作。记得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县城关的农村集市又允许重新开放了。集市开放伊始,许多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比国营商店的牌价(有价无货)高多了。但比开放前在街头巷尾偷偷摸摸交易的价格还是低一些的。约过了半年,集市上物资的品种、数量、质量都逐渐有所增多与提高,价格也有所回落。但出现了一些所谓“投机倒把”和“违法乱纪”现象(用现在的眼光看,那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发展商品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同时也产生了少数农民弃农、工人弃工、个别干部离职经商等事例。于是,不少思想保守的人或具有极左思想的人就沉不住气了,纷纷写信或写文章指责“资本主义回潮”,建议中央重新关闭集市。县财委的一位副主任对我说,风向有点不对头,可能集市又要关闭了。我心里十分着急,赶紧向所里寄回一份《昌黎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希望能被转呈到上面去。报告的基本内容是:1. 集市开放利大于弊,不能因发生某些不合格的事就因噎废食,萌发重新关闭的念头。2. 对集市不妨统其大纲、无为而治,效果可能反而会更好一些。众多的管理人员可予以适当精简。3. 像薯秧这类物资销售,即使让其长途贩运,没有持大队证明信亦有何妨,大不了让投机者多赚几个钱,但对生产者与种薯者都有好处。在当前来说,只要对生产有利的就是合理的。4. 农村生产应以经济杠杆为主,思想教育为辅,要看看事实再说话。不干,五两半,是调动不了积极性的。5. 光靠一次次的整风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关键在于建立规章制度。6. 要加强对农村干部民主作风的教育与监督,以缓解干群间的紧张关系。7. 可否考虑以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来较迅速地恢复目前过分萧条的农业生产。这份报告是1962年5月初寄回所里的,7月初,孙冶方给我寄来一封回信,说我的报告已由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发表,受到首都各界重视,希望我继续观察研究,及时反映下情上报中央,以利改进基层工作。我回所后,张闻天还找过我几次,议论与农村集市相关的一些问题。

1964年10月份,康生、陈伯达派出一个70多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经济所搞“四清”。有工作组员要我交出孙冶方写给我的那封信(我有小虚荣心,曾将此信向一些人炫耀过)。我回家一看,里面有“受到首都各界重视”、“继续调查,上报中央”等语,怕工作组引申开去,对张、孙不利。人家所长地位那么高,对我这



经济学人

个刚来所的小青年如此重视、鼓励,真让我感动。我若把信交上去,那不是太“小人”了吗?就把信烧掉了。那时,工作组已代替了所党委,而各研究室则从群众中推选临时负责人行使权力,室主任骆耕漠与副主任何建章已在被批判、审查之列。政经室临时负责人李某某受工作组指派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你出身不错,党还培养你去留苏,你应对党知恩图报。咱们好比是国民党的兵,枪口调过来就是自己人。你要反戈一击,把信的内容回忆一下,向组织交待,争取立功。”我也看出他们是一番“好意”,想争取、帮助我,求得“进步”。可我当时真的是转不过弯来。我心里想: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所党委不就是党吗?怎么一夜之间,他们就都是敌人了?连中层干部何建章、孙尚清等所谓“八大金刚”也都要被打倒了?党培养这么多高知人才多不容易呀……我回答:“可他们并不是国民党呀。我的枪口为什么要冲他们去呢?”我拒绝交待信的内容,推说“忘记了”。第二天,我对张纯音说:“这是一部分人要整掉另一部分人,以抢夺所领导权力。你看看,工作组准备扶上去的那一位(那时还不知有三个人要上新领导班子),无论革命资历、学问、人品怎能与现领导班子比?一个只会向中宣部打小报告的、不学无术的人物当经济所所长,成何体统?我要向毛、刘、周、朱写信,请他们派人来查办。”张纯音连忙说:“千万别写信!这几年留学真害苦你了,你太幼稚,不知天高地厚。这事很复杂,工作组是有来头的!你也别到处乱放枪,你的每一句话都有人汇报上去的。听说,你已被内定为‘现行反革命’,运动中烧毁重要罪证。”我听了吓一大跳,但我不服,我又没杀人,怎么是“反革命”?于是继续到处向人宣扬自己的“高见”。回过头想想,工作组对我还是爱护的,因为实在找不出我与张、孙的渊源,纯粹是受苏联学术思想影响的问题。为了我不再继续干扰运动,使让我到山东黄县下丁家(先进模范村)去劳动锻炼去了。